

中国教育大系

20世纪中国教育（四）

总主编 顾明远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教育大系

20世纪中国教育（四）

总主编 顾明远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教育(一、二、三、四卷)/顾明远总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7

(中国教育大系)

ISBN 978-7-5564-0809-2

I. 2...

II. 顾...

III. 教育工作-概况-中国-20 世纪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124 号

20 世纪中国教育(一、二、三、四卷)

20 SHIJI ZHONGGUOJIAOYU (YI ER SAN SI JUAN)

总出品人 潘启胜

出品人 方平

责任编辑 李作君 刘 宁 孙亦君 万 婵

责任校对 刘慧芳

封面设计 牛 红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430015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 20

印 张 255.5

字 数 918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0809-2

定 价 1200.00 元(本系列四卷)

3850.00 元(全套书共十二卷)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目 录

一、概述

香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冯增俊(2927)
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	操太圣(2934)
香港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唐玉光(2946)
香港学校教育政策发展十五年(1982—1997)	曾荣光(2951)

二、香港教育文献法规选

香港教育委员会报告书	(2959)
香港教育条例	(2975)
香港实用职业教育委员会报告	(2978)
香港教育报告	埃尔文·宾尼(2996)
教师培训委员会报告	(3008)
香港教育调查报告书	N. G. 菲莎(3015)
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书(节录)	(3028)
香港教育政策白皮书	(3049)
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	(3054)
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节录)	(3057)
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三号报告书——高等教育的体制及私立学校的前瞻(节录)	(3075)
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五号报告书——教师专业(节录)	(3095)
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七号报告书——优质学校教育(节录)	(3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节选)	(3124)
香港教育条例	(3126)
21 世纪教育蓝图:终身学习,全人发展——香港教育改革建议(摘要)	(3149)
跨进 21 世纪的全人教育(节录)	(3158)

三、香港教育研究文论

《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序	杜祖贻 顾明远(3162)
香港普及教育的骄人成就及其发展展望	吴福光(3164)
香港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杨纲凯(3169)
香港中文大学——融会中西、继往开来的学府	李国章(3175)

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和前景	吴家玮(3180)
香港各大学的工程学教育	苏廷弼 杨小兰(3188)
香港师范教育	王学风(3192)
香港职业技术教育	马早明(3198)
香港工业教育及职业训练	黄浩炯 何景安(3208)
香港成人教育发展	王连红(3212)
香港学前教育	王季云(3219)
香港的私立学校	谭万钧(3233)
香港的理科教育	柳爱华(3242)
香港学校道德教育	冯增俊 马建国(3248)
香港的公共卫生教育	李绍鸿(3268)
香港的中医教育	梁秉中(3273)
香港的考试制度	蔡炽昌(3278)
我在教统会工作的日子里	范徐丽泰(3284)
香港教育委员会的工作	郑慕智(3287)

四、香港教育大事记

附录

香港教育发展数据	(3316)
香港教育法规索引	(3362)
香港重要教育文献索引	(3364)

一、概述

香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冯增俊

一、研究香港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香港是一块仅一千平方公里、人口 600 万且无资源可言的弹丸之地,但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南中国海岸的“东方明珠”、世界著名的商埠、购物天堂以及世界金融、贸易、旅游、信息中心之一,被誉为“亚洲龙”。1995 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逾 2.4 万美元,人均寿命男女分别高达 75 岁和 81 岁,近年来连续被世界权威机构评为最佳投资地区和最有发展前景的地区。考察香港战后经济历次转型和连续起飞的历程,可以看到,推行教育现代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其特有的实践和经验,揭示其中的时代启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有助于探讨东方型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香港是战后世界诸多新独立国家和地区学习西方推行教育现代化、办教兴邦中少数获得成功的佼佼者,探讨它从资源匮乏和战后生存危机到成为“亚洲龙”的发展经验以及用战后 50 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 300 年的发展历程的秘诀,将有助于认识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具体特征,从而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理解。

2. 有助于探讨现代教育规律和现代教育模式。香港以华人为主体的,既受到中国封建教育影响又受到英国古典教育强烈作用,且曾建立过中国旧教育制度并又套搬了英国传统教育体系,探讨这种既复杂又保守的教育体系的时代更新和模式转变的具体进程,将有助于认识现代教育发展规律以及这种规律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模式变体以及演变阶段和方式,把握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推行改革的切入口、攻坚部位等,找到建构现代教育模式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3. 有助于把握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香港作为一个多元社会,中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此汇聚、交织和演变,因而提供了教育与多元文化的最直接关系,并将向我们展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最彻底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教育变革过程中的最真实的冲撞、融会及更新的过程,为中国走向多元化社会进程中相应的教育改革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4. 提供有益的示范和可直接借鉴的经验。香港除政体外,与内地有重大的相似性,如都属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使用同一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在求学、兴学及教育传统上均有一致之处;经济发展与内地密切联系,尤其与珠江三角洲已一体化,都将提出类似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要求;原先发展起点相同,都注重追赶发达国家,因而发展类型相同且过程一致,有一定的可比性和直接借鉴的意义。

二、香港教育现代化演进的基本历程

香港原属广东东莞县的一个小渔村,香港开埠直接源自于鸦片战争这一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英军强占香港后,牧师莫礼逊(MORISON)于 1843 年 11 月创办了香港第一所现代意义的教会学校。综观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教育现代化进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把这一进程划分为两大阶段。战前的百年香港教育有一定的发展,在亚洲较早创办了香港大学(1911 年),且在当局大力扶持下

* 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英文教育日隆。但相对来讲,这一时期香港教育基本上属传统精英教育模式,主要为少数上层人服务,目的是要维系英人对香港的统治,本质上是脱离生产实际的。香港大学初期仅有 54 名在校生,且偏重人文古典学科,就是要培养在港的英国殖民代理人和管理阶层。香港教育的真正发展是二战之后。二战和中国国内战争,使大批难民和科学家,工厂及资本流向香港,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逐步转型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真正起步。许多人认为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发展起来,分析表明,转口贸易对香港经济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最重要的乃在于它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一次次转型升级,形成一波高过一波的经济飞跃浪潮,促进了香港从单纯的小型转口贸易向现代大型工业、金融、贸易、旅游服务业一体化经济体系发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世界著名大商都。教育在经济发展中也获得有效的改革和较快的发展,形成一个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英国的、特色鲜明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是一个不同于前一阶段伟大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主要集中表现为四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浪潮。

第一次是于 1945 年前后掀起以扩大教育规划、满足发展需要为特征的教育改革浪潮。从而第一次对以英文古典教育为主体、以培养少数上层精英为主的英式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改革,第一次提出香港教育必须为香港发展服务,为香港人服务。这次教改的核心是:(1)大力普及初等教育,使每个儿童都有书读;(2)改独尊英文教育为中英文教育并举,创办新大学满足有志青年求学;(3)倡导从古典人文教育转向实用为主的新教育,尤其是大力举办适应当时大量从内地移港工厂技术要求的职业培训。该次教改直接导致了港英当局特邀英国曼彻斯特首席教育官彼舍(MR. N. G. FISHER)来港考察两个月,发表《彼舍教育报告书》,提出下列重要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小学教育以满足日益增多儿童入学要求,并在低年级尽可能用中文讲授,三年级后再设英文,小学要毕业统考,统一颁发文凭;二是鼓励民办助发展私校;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是积极推行成人教育;五是扩大师范教育,培养合格师资;六是更新学校设备,多建新校。该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对香港教育改革有重要影响。香港于 1950 年和 1952 年相继举办小学和中学会考,分中文与英文两种举行,并使各行业建立起按教育水平录用员工的人才使用体制。这次教改对香港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顺应了以华人为主的工商企业的发展,教育的扩张既保存和吸纳了大量优秀人才,又培养了各种香港发展需要的大批人才,推动了 50 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在中国受外国封锁时使香港丧失转口贸易港的不利条件下顺利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2)是一次现代教育对英国古典教育的公开宣战,促使香港教育开始走出世袭精英教育的模式,放弃以古典人文教育为核心和以等级教育为特征的教育体系,转向为经济发展服务,为普通大众服务。香港大学在校生首次突破百人大关,1951 年增至 852 人,并开设多种工商科目,1956 年设立了校外课程部。此外,香港还成立了多所专上院校,并大力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为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3)是一次中西教育文化上的冲击和交融,意味着单纯套搬英国教育模式时代的结束,开始走向探索建立香港发展的教育模式的新里程。

第二次是始于 60 年代中期并延续到 70 年代以推进教育转型促进工业化特征为特征的教改浪潮。60 年代后,香港工业发展很快,1966 年本地生产总值已达 136.4 亿港元,纺织及制衣业规模最大,工厂迅速增加,从 1960 年 4,784 家增至 1969 年 14,078 家,工人从 21.6 万增加到 52.4 万人,而且新兴工业如橡胶、电子、金属加工、玩具等行业开始兴起,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对各种人才需求量剧增,另一方面以往仅注重培训低层次技术工人为主的教育体系已日益不适应要求,迫切需要培养大量中等以上的高技术人才,从而触发了新的教改浪潮;(1)扩大教育规模,学生人数激增。一是大力普及小学并扩充中学教育;二是在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书院基础上成立香港中文大学(1963 年 10 月 17 日),1967 年把三年师范学校升格为学院,并在中文大学增设教育学院,以解师资严重不足;三是成立浸会学院、岭南学院(1967 年),1969 年摩理臣山工业学院开始招生,并成立工业训练中心。(2)推进教育转型,强化为经济发展服务。一是转变传统科目,实行重大改制,以适应香港两头在外的典型外向型经济对现代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需要,如中文大学自创办起就注重开设如电脑、电子学、生物化学等各种高新技术科目,香港大学一改以英国古典遗风著称的学术传统也先后增设了工学院、建筑学院等应用性院系,两大学都加速专业调整,加重理工科比例。二是适应香港技术升级,提高技术教育档次,创办香港理工学院(1972 年)。该院创办是香港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推进香港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工商界人才极为匮乏,按当时测试,香港的主要工种必须增加 2,000 个技师才能达到英法类似工种的技术水平。该院成立当年就招收 12,000 多人,到 70 年代末在校生已近 2 万人,80 年发展成为拥有 7 个学院共 24 个学系,开出 230 多项课程,在校生近 3 万人的全港最受工商界青睐的学院。现时香港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经理都毕业于该校。三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中等以上成人技术教育。除大专院校开设的成人专业课程外,1965 年设工业训练咨询委员会推动工业技术培训,1971 年后相继成立多所工业学院,到 70 年代末能提供 3.5 万个学位。四是大

力发展非正规教育。60 年代中后期,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参与职业技术培训,兴办各种成人学校,对提高香港整体劳力素质起了重大作用。(3)加强基础教育,强化普及教育水准,在普及小学教育基础上,提出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务,进一步提高香港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总之,第二次教改运动基本上实现了香港教育的转型,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基点的强有力的经教互动机制,有力促进了 70 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

第三次是起于 80 年代初的以促进现代教育革新、推动高科技兴起的教改浪潮。80 年代初,香港现代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金融、房地产、旅游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更加成熟,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产业开始从劳力密集型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迫切需要改革教育,以便在更高的水平上整合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适应经济的更大发展。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香港当局下决心改革教育,在 1978 年 9 月全面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同年发表了《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提出扩大高中教育规模,成立更多的工业学院。1981 年特邀国际教育顾问团全面评估香港教育制度,次年发布《香港教育透视》报告书,从而拉开了第三次教改运动的序幕。这次教改主要表现为:(1)继续扩大教育规模,一是扩大香港理工大学规模,专业体系更加完善,在校生达 2.8 万余人;二是于 1984 年创办城市理工学院,办学次年就招收学生 4,500 多人,专业达 20 余个;三是扩大工业教育规模,新建工业学院 4 所,工业训练中心 10 所,使两者分别达到 8 所和 18 所,至 1990 年时已可提供 11 万个各种学位。(2)重视教育规划,强化行政统筹作用,先后成立教育统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职业训练局等机构,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每两年发表一次咨询报告,突出调动全社会参与教育和宏观统筹的作用。(3)建立系统的科技教育体系。在两所理工学院基础上,1986 年再兴建旨在成为一流学府的香港科技大学,并创建科技学院,形成不同层次类型的科技教育体系。1991 年全港接受不同层次科技教育人数 10 万人,1995 年达 20 余万人,科技教育带动了香港科技发展。1983 年全港电子技术人才 4,400 人,尔后每年以 10% 的速度增长,1990 年已达万人之巨。(4)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成立公开进修学院,1979 年首期招生就达 10 万人之巨,成为开发香港人力资源的一支重要力量。可见,第三次教改促进教育更大发展,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人才,支持和发动了香港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浪潮。

第四次是起于 90 年代初的以创建具有地方特色教育体系实现香港社会转型的教改浪潮。80 年代末,香港产业已倚借国内及东南亚各国实现了低层次产业的转移,为创建高新的地区产业体系获得了雄厚资金和广泛的支撑关系。自此,香港信息业异军突起,高新科技产业集群开始形成,产业出现了新的转型升级,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而使教育改革与政体改革一样受到港人的广泛关注。自 90 年代以来,香港教改频繁,突出表现为:(1)强化科研意识,注重研究型人才培养。一是提出建立具有世界水准的“卓越学科中心”,把“投资放在其先进设备和学术活动上,以维持其在国际上的优先地位”。二是大力扶持高校科研活动,加大科研投入,1995 年审批项目 454 项,拨款 2.05 亿港元,平均每项 45.15 万港元,而 1996 年则达每项 55.25 万港元,其研究经费比 80 年代成倍增长。三是创建科技大学,大力培养研究类科研人才。四是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1985 年,全港在学研究生不足三千,1991 年达 6,960 人,1995 年达 13,643 人,且攻读研究型高经学位人数倍增。(2)注重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三学院升格为大学。升格三所大学,是香港 90 年代初教育界的大事,从根本上突破早期偏重单一技艺性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了把培养有科研基础、素质全面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放在首位的办学方针,其二是各专上院校招生规模一再扩大,尽管适龄青年人数不断增加,入学率仍从 1990 年的 9% 增至 1995 年的 18%,开始进入大众型教育阶段;三是高教专业设置更加广泛,几乎覆盖所有有关行业。(3)强化教育质量。一是强化普及教育质量,在实现全面普及中学教育基础上,推出诸如目标为教学语言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语文能力等教改;二是强化专上教育质量,注重学科评估,努力提高学科质量水平,并实施教育实绩考评制度,完善校外考试委员制度。(4)建构新型的教育体系。以往香港教育以梯级分工为主,由下至上各司其职;工业学院培养高级技工及技术员,理工学院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型专业人才。三所学院升格大学以后,这种教育体系的分工被打破,形成一种在梯级分工基础上以专业分工为主的新教育体系,这种体系以突出专业特点和办学类型作用于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应层次的产业领域,适应了新的产业转型升级。(5)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不仅与世界各著名学府合作,也强化与内地教育学术交流协作,如香港中文大学与广东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进行有关南中国发展的研究,并在北京成立联络处;理工大学与国内 14 所理工大学建立协作关系;科技大学正与国内外各大学合作成立研究型大学协会等等,充分显示香港教育正在大力推进国际化迈向光辉的 21 世纪。总之,第四次教改秉承了战后香港教育现代化运动的一贯宗旨,其目的都是要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发展,但与前三次又有质的不同,即前者主要是在规模扩张中推进教育的转型,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推动转型中扩张发展,努力创建有香港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是一场关系到香港教育跻身于世界前列的重要改革。

香港教育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系统的教育体系,实行幼儿园3年、小学6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2年、大学本科3年、硕士研究生1—3年、博士研究生2—5年的教育制度。儿童3岁入幼儿园,6岁入学,实行九年强迫义务教育,1993年入高中阶段学习者达90%以上,表明已基本普及两年高中阶段教育。中三后考试分流,升学者分读文法中学、工业中学、职业先修学校等。中五及相应学历者毕业后,参加香港普通教育程度会考,升读大学预科、工业学院、科技学院等。一般说来文法中学以升学为主,但其他学校学生也可与中七毕业生一样参加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合格者进入各相应大学。1995年,香港有幼儿园731所,学童467,718人;小学860所,学生470,997;中学575所,学生479,301人;其中文法中学419所,学生416,151人;工业中学21所,学生21,395人;职业先修学校26所,学生22,299人;实用中学2所,学生约900人;特别技能训练学校3所,学生约900人。香港官方认可专上院校8所,其中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和岭南学院,共有在校生76,357人,被认可的树仁学院有在校生2,600人。7所工业学院在校生48,421人,两所科技学院在校生12,961人,香港教育学院在校生8,759人,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有到校系统上课学员20,085人。21所工业培训中心每年培训人员达2万余人。据初步统计,全港各种成人教育课程的注册人数,近年每年均逾50万人次以上,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日益发达的教育是香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结果,也是香港进入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实现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根本保证。

三、香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以上可见,香港人以其聪明才智,积极有力地推进了这一独特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运动,成功地推进了经济的连续起飞,促进了香港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创造了时代性的辉煌业绩,其主要经验可归结为下列方面:

1. 转变办学模式,坚持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战后香港教育改革的最成功经验是敢于变革英国古典贵族型精英教育模式,坚持推进教育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为其服务,逐步建立起教育与经济的互动机制。如战后顺应华人社会发展,改独尊英文为中文与英文并举,倡导中文主体英文实用的教育策略;坚持教育民主和民主办教原则,允许多种办教体制并存,使教育获得宽松的发展环境;坚持注重实效的办教原则,放弃传统纯学术的教育模式,突破封闭的脱离实际的办学机制,坚持按实际需要办学,设专业、选课程,培养各种香港需要的人才;积极推进平民教育运动,在加速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成人教育也得到蓬勃发展,从而较快地全面提高香港社会的劳力素质和文化水平。香港教育现代化进程,始终贯穿着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办学模式从传统转向现代,逐级转型提升的进程。这是任何国家推行教育现代化实践中的最根本的经验。

2. 重视科技作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香港推行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重视科技作为改革社会发展经济的带头作用,建立起系统科技教育体系。香港50年代创办理工学校,尝到了甜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科技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有特色。60年代后在改造两所大学的同时,创办工业学院和理工学院,大获成功,引发70年代经济飙升。80年代在兴建城市理工学院的同时,再度兴建科技大学与科技学院,如此豪举实属罕见,可见港人对科技教育确实情有独钟。现香港已建立起从初级科技教育到中等、专科、本科乃至研究生的系统的科技教育体系。中小学系统开设各种科技课程,现有21所工业中学、7所工业学院、2所科技学院、1所科技大学,据初步统计,目前接受科技教育学生数占全港同等水平学生数近一半。仅1995年,就读工业及科技学院学生61,382人,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有近3万名科技类学生,科技大学有本科生5,139人及研究生1,156人,此外其他专上院校科技类学生约1万多人,足见香港已建成强大的科技教育基地。正是这一科技教育基地的形成,促进了香港教育体制的围型升级,使传统教育模式获得了根本的改造,建立起崭新的现代教育文明。正是重视科技教育,才为香港工业化培养了一批批出色的建设大军,使香港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国际大都市。

3.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养实用性人才。这是香港教育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经验。战后,香港急需发展经济,内地迁入的工厂也急需大量技术工人,但当时香港大学严重脱离实际,人才无法解决,从而促使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也由此促进了教育模式的改造。职业技术教育和科技教育一样,为香港产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改造了香港的劳力素质。从50年代的劳工培训中心到理工学校,60年代的工业训练处,到目前从中等专上院校均已普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建立起从初级到中级、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以及正规和非正规形式的完整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赋予整个教育体系很强的职业技术倾向。不仅培养了大批能商实干、能工巧匠的实用性人才,而且使香港的各级各类毕业生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职业适应能力和实干能力。据称,香港专上院校中近三分之二的专业属实用性的,都具有职业性特征。

4. 坚持多元化教育体制,实施多样化办学形式。香港教育现代化的另一经验是坚持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中

西合璧,兼容并包。如顺应历史潮流和市场规律,放弃单一英文教育,允许多社会团体的办学方式存在,倡导自由办学,平等竞争;而自由办学又促进了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使不同社团及经济集团都积极通过一定形式办学来改变本身的生存条件,从而使教育成为引导经济发展、改造移民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多元化教育动员了全社会的办学积极性,多样化的办学形式使全港人都有可能从不同方面支持教育,并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教育。目前香港已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式教育体系,成为一个体系完整、覆盖面广泛的教育化社会。

5. 注重通识教育,培养健全的现代人。香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很重视人的整体素质发展,强化道德熏陶和学校德育工作。中文大学自创办后,就坚持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健全人格。目前香港主要专上院校都重视通识教育。60 年代香港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在中学开设社会经济及公共关系课程,80 年代初又根据新的教育形势,先后发布了德育指引、公民教育指引以及性教育指引等,教育署、廉政公署以及诸多社团都组织和发放德育教材和材料,加强年轻一代的品德教育,培养知识渊博、专业拔尖、社会适应力强、有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其 1993 年报告书中指出,在当今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唯有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大学教育最重要之功能应在于培养具有全面了解能力之人才,不论其专业如何,必须具备广博之一般知识”。这一观点正是香港推进教育现代化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经验。

6. 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香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使教育与科研与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是根据科研和生产的需要设置相应院校及专业科目,培养需要的人才;二是强化学校与用人单位的直接联系,政府不予干预,让生产和用人单位对专业学科进行直接筛选;三是设置严格的专业或课程评议机构和考核制度,强化专业实效性,淘汰不良专业,使课程建设始终瞄准经济发展的前沿;四是坚持多样化办学方式,促进教育与经济科研的互动和结合;五是倡导学校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或组织攻关课题,或参与社会咨询,目前各大学均有学者参加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各项工作,提供工业技术、电脑、工业发展等咨询服务。香港各学校已把为社会服务作为最基本的职能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在最近 3 年间都有上百人参与了上百个咨询服务机构的活动,有些还担任了要职。

7. 社会重视,科学管理。正由于香港教育坚持模式转型,为经济发展服务,从而使全港上下重视教育,积极投资,热心办学,这是香港教育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政府所拨教育经费逐年上升,1975 年至 1985 年增长 5.2 倍,而 1985 年至 1991 年又增长 5 倍多。同时社会投资办学踊跃,教育经费中每年约有 6—8 亿港元来自社会捐助,香港赛马一次捐资近 20 亿港元于科技大学基建费用。香港各界对教育之热心也为各地所少见,香港兴建的大专院校包括香港大学,都是社会各界推动的结果。香港非常注重教育的科学管理,强调人才预测,每一专业课程设置必须提供人才调研报告,并经常对课程进行效益评估,不良者终止拨款。香港多次特邀国际教育专家到港咨询教育,成立教育统筹委员会,每两年就香港教育的重大问题提供一份咨询报告。香港各教育团体经常举办各种教育研讨会,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为强化科学管理,香港还设置了一些相关机构及制度,如学术评审制、目标管理制、香港学术评审局、大学教育咨询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正是这些努力,使香港教育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促进了香港经济连续飞跃。

战后香港推行教育现代化成果巨大,但与面临新千年以及主权回归赋予的巨大发展要求相比,仍有许多重大问题,诸如消除有关殖民教育色彩的问题;教育经费投入过低(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8%,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 4%);以及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语文能力下降、小学半日校、新教材的编写、大学学制等问题都困扰着当前教育的发展。目前,香港教育工作者从各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他们正以新的姿态努力策应未来的挑战。

四、香港教育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启示

以上仅作简要探讨,但也可使我们发现,一百多年来香港的教育现代化实践,实质上就是努力推进香港教育从封建的传统形态转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形态的历史变革进程。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探索过程。揭示这一实践及经验所蕴含着的深刻的时代启示,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是极为有用的。

1. 应尊重并遵循后发型和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独特形式和发展特征。考察香港教育现代化实践,最重要的时代启示之一,就是使我们认识到,香港现代化从一开始就置于世界现代化形势之下,因此走的是一条与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很不相同的后发外生型发展道路。一是这种后发型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早发型不同,后者推行先机械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道路,而后发型却必须推行从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发展教育具有关键性作用。二是这种

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的启动并非是自发的,也没有缓慢而漫长的自然生长过程,而是在外界巨大发展压力和政府的干预下强行启动,通过示范作用,学习先进经验,以跳跃的方式迅速发展。可见,后发型教育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它要借鉴外域经验,但并非是照抄;它能实现较快的赶超,但由于引进先进模式实现跳跃发展,既中断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会取消早发型那种在缓慢演进中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磨合过程,造成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和错位,如一方面迅速兴建了大量新校舍,很快普及义务教育和高教大众化,而另一方面片面追求升学率、高分低能、文凭主义的现象越演越烈;一方面要求教育促进生产发展,培养出大批毕业生,而另一方面求才如渴的企业却找不到合格的毕业生等。香港的实践证明,只有深刻地认识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的特征,才有可能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做出科学的决策。

2. 把握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建构实践型教育模式。香港教育现代化实践的另一时代启示是,它证明了一个简朴但又不易为人们认同的真理:现代教育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并非是教育发展了,经济就能自然发展。香港实践证明,现代教育的每一次成功改革,本质上就是进一步推动教育走出贵族的学术堡垒,更紧地与生产相结合,而两者结合得越紧,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教育也才能因此获得发展。尽管香港教育战前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还引进当时先进的英国教育制度,办了大学等,但仍沿袭封建教育模式,发展缓慢。战后在生存的压力下积极改革教育,逐步同生产结合起来,推进了经济的起飞。香港战后实际在建构着一种实践型(PRACTIC 亦称实用型)教育模式,即一种表现为教育与社会整体互动发展的体制,其核心为:一是必须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二是办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三是必须根据最大效益原则,按市场竞争机制发展教育。香港实践证明,坚持这种模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而能否按不同经济水平来建构这一模式的相应形式,就成了衡量现代教育意识的重要标志。

3. 坚持借鉴与创新结合的发展原则。战后香港教育现代化的真正启动得益于两点:一是借鉴国外现代化教育模式和发展经验;二是能结合本地实际,作出相应的创新。作为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社会,教育必须具备很强的开放性,对各种教育经验兼收并蓄,积极学习,但这种学习并非盲目照搬,而是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习的实际效果,把借鉴与创新结合起来,从初期较多地借鉴逐步过渡到具有较多的创新,逐步建立起符合本国本地实际的教育体系。所以,香港教育貌似沿袭英国,实际上包含着世界各种教育经验,包含着香港教育工作者的独特创造。

4. 展示了东方文化在教育上的时代更新。当代探讨以中华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为世注目,其中以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文化与现代化相悖的论断最为典型。自此西方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落后文化,而保持这种文化的民族就是落后民族。香港这一中国本土上的独特实践有力证明,尽管作为整体的儒学体系已经过时,但儒学中诸如忠贞爱国、社会责任、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等人格价值仍闪耀着时代光芒,尤其积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在时代的作用下正在获得现代性更新,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力量,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弥补西方文化不足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践不仅有益于审视儒学在教育现代化洪流中的嬗变和更新,也有助于洞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与儒学体系的对抗及相融合的文化整合过程。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实践,它有助于从教育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批判继承,从中创建一个符合时代主体搏动的新民族文化。

5. 注重教育调研及规划,强调教育的政府行为。香港推行较彻底的市场经济,但仍非常重视教育调研,制定各种教育规划。它显示,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只有通过制定教育规划,从中注入政府行为,才能使教育改革在民众认识不足下启动,避免改革造成的混乱和无序,把握跳跃快速发展的方向。规划集中反映了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调控,保证教育改革和发展符合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总体目标。香港注重人口普查和人才预测工作,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教育规划,教育模式的转型和规模的扩张,80年代后研究生数量大增,这都是根据教育规划推行的。教育统筹委员会每两年的咨询报告,实际上也是为决策提供的一种规划。这些规划有力地保证了教育按经济社会要求发展,体现了官方和财团对香港教育“积极不干预”的干预行为。活力来自市场,方向全靠政府。香港经验证明,制定科学的教育规划是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必备的重要手段。

6. 必须重视和大力发展科技教育。这是香港教育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启示,科技是社会变革中受阻最小、作用最大的带头因素。鸦片战争后一切变革社会主张均触犯“龙颜”,而“船坚炮利”却为朝廷接受,正是这些科技传播最终改变了中国教育乃至政体。香港建立庞大完整的科技教育体系,既有力地改造了旧教育模式,也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能扼制所谓教育过剩的弊端,因为过剩的只是过多的文史哲学生,而并非有一技之长的实用性科技人才。这点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时都应吸取的时期性经验。

7. 教育观念现代化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香港的实践表明,教育观念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与筹建一所新学校相比,教育观念更新要艰巨得多,但也重要得多,且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后者决

定的。因此这既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突出表现为:一是要认识现代教育的重要性,懂得什么是现代教育和如何办好现代教育;二是要真正建立起教育为本、教育立国、教育先行的国策框架;既使国家发展放在教育这一基础上,又要使教育得到充分的支持,既使教育真正为经济发展服务,又真正确立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的思想。这不仅是教育者的认识,而是整个民族教育观的更新。香港的实践告诫我们,教育观念现代化是一项极其艰巨且相当重要紧迫的历史任务。

参 考 文 献

- [1] 香港政府:《香港》(1994、1995、1996),香港。
- [2] 香港教育资料中心编:《教育资讯》1990—1996 年。
- [3] 吴福光编著:《港澳教育剖析》,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4] 冯增俊主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亚洲四小龙、珠江三角洲教育经验的时代启示》,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

操太圣

导 言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石器时代,香港地区就有中国先民在此居住与生活。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分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香港地区属于南海郡的番禺县,从此香港便正式纳入了中国的行政版图。^①近代以前,其文化教育与内地无异,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所习者不外乎子曰诗云,以致仕为鹄。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香港。香港教育从此走上了与内地迥然有别的发展道路,其教育制度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殖民主义烙印。1984 年,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如今,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教育史也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为了有利于“九七”以后香港教育的平稳过渡与顺利衔接,促进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回顾和总结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探讨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因此,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香港教育制度史在以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 40 年代末阮策先生出版的一本《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 1948 年版)以及其后人们零星发表的若干论文外,多年来鲜见专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面世。^②即使是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也在观点、资料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从深化中国教育史研究(包括香港教育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指导思想,以香港教育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为依据,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性质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剖析,以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利于香港教育在“九七”之后继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在正文展开之前,需要说明三点:1. 教育制度的定义。教育制度一般指各种教育机构的系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的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一是专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③本文取第一种用法。考虑到港英当局一贯奉行行政主导,故本文在论述程序上是先教育行政后学制系统。2. 日占时期的了解。由于日军占领香港仅三年多时期(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在香港被外人占据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加之日军此时忙于战事,虽竭力推行殖民教育,但往往有心无力,绩效不彰。故本文未将日占时期的香港教育制度单列一节加以论述。3. 英占时期的分期。本文依据国际和中国政情的变幻、港英当局教育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香港学校教育制度完善的程度,将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史分为英占初期(1840—1900)、英占中期(1901—1941)和英占后期(1945—1997)三大段。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大致的。

一、英占初期的教育制度(1840—1900)

19 世纪中叶,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沼,香港岛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英国强占的。从此,香港教育被烙上了殖民主义的印痕。

* 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一) 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英国占领香港之初,并不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将之交由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伦敦传道会分别办理。直到1847年12月6日,港府才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宣布以每月10元为标准资助三所中文学塾,并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

教育委员会是在香港出现得最早的专责教育管理事宜机构,其组织方式来自英国,设置的目无非在于逐步加强对香港教育的影响,其时以宗教教育的渗透为主,1847年3月13日,戴维斯总督在给殖民地事务部的信中表达出这样一个愿望:“倘若这些学校将来能够完全由受过新教的传教士所熏陶的基督徒提任教员,那么教导香港当地居民,使其皈依基督教便大有希望了。”^④

1851年,接受政府资助的学塾增至5所,至1854年完全归由港府接管,时称“皇家书馆”。1857年5月,港府设立视学官,负责巡视及监管所有的皇家书馆,首任视学官由德国传教士罗传列牧师担任。为使管理工作能达到控制学校的实质性效果,他订定了一套《皇家书馆则例》,规定对学生实行按班级管理,要求教师具备完整的学生名单、出席登记表及教学记录,以便视学随时查阅。这是香港最早的一份学校教育管理条例,对健全学校行政制度多少有些意义,但用意更为明显的恐怕是规定学生要尊敬外国人,“遇有任何欧籍人士,特别是政府官员到校参观,进入教室时,教师要令学生起立致敬。”^⑤

事实表明,英国统治香港岛的时期,香港教育基本上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教育行政机构操纵在教会人士手中,学校教育实际上已成为传教和巩固英国统治秩序的辅助工具。

19世纪60年代前后,英国政府开始改变以往对教育的态度,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促其走向世俗化。英国国内教育状况的变化影响到了香港。其时,中国内地战乱频仍,大量人口辗转至港,造成学龄儿童人数大增。而港内中文学塾水平有限,教会学校又于50年代初陷入困境,更促使港英当局开始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与教会争夺香港教育的主导权。于是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

1860年,教育委员会被改组为教育局,成为专管官立学校的政府机构。推崇世俗教育的理雅各此时已成为该机构的实际操纵者。是年7月3日,理氏在教育局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计划”,后来又以书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建议创办中央书院,重视英语教学。

1862年中央书院成立,首任校长由史钊活担任。史氏同时又兼教育局视学,负责监督全港所有官立学校。至此,香港教育事业开始脱离英国国教会的控制,由政府官员管理,直接对总督负责。从本质上说,革新计划是一项脱离英国国教的计划,它主张用世俗管理取代教会统治,即将世俗主义引进圣公会的教义中去。^⑥

史钊活袭袭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张,并付之于实践。香港教育的世俗化基本上是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实现的。1865年,教育局扩大为教育司,他出任教育司的首长,继续引导官立学校脱离教会的影响。史氏在职近20年,1879年由欧德礼继任视学,而中央书院校长则另由黎德担当。由于两人意见相左,终导致中央书院脱离欧德礼控制,成为一独立机构,直至黎氏离任后方又重归教育司管理。

(二)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中文学塾在英军登临港岛之前就早已产生并得到发展,它是英占之前香港唯一的初等教育机构。从整个中国教育史来看,它构成了近代新式学制正式建立以前中国教育的主体。

香港开埠以前,这些私塾规模不大,既没有严格的程度划分,也没有明确的教学年限的规定,私塾里所设课程以读书习字为主,同时重视道德、人伦的陶冶。常用教材为传统的“三、百、千、千”,这些学校在中国内地废除科举制度之前还是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⑦

香港较早的西式学校是教会人士开办的。教会学校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现代教育制度的滥觞。在港岛最早创办教会学校的宗教组织是马礼逊教育会。1842年2月,英国驻华使臣兼商务监督璞鼎查接受该会理事会申请,拨地供他们修筑校舍。是年11月1日,马礼逊书院由澳门迁至香港,不久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式学校、之后美国公理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等纷至沓来,建校传教。

1873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补助书馆计划》,对教会办学极力鼓励和支持,激发了基督教学校的兴办,而1879年补助计划的修订,对宗教内容的认同则连天主教学校也踊跃加入受补助之列。到19世纪末,接受政府补助的教会学校数目已达101所。^⑧这些学校多为初等教育性质,常实行免费教学,课程除圣经、英文等西方科目外,也设有中国文学、写作、历史和地理等传统知识。

英军统治香港之初,当地居民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一种外来制度的隔膜,很少有人愿意进西方传教士们设置的学校求学。这种情况促进了中文书塾的发展,1844年港府首次公布这类学校数字为7所^⑨,次年则增至9

所,学生 145 人。^⑩1847 年港府首次对 3 所学塾实行资助,1851 年增至 5 所。据港府的中英文通告称,这些受资助的中文学塾可由政府提供教室以及教师薪金,学生只需每月给教师铜钱 25 文,“以作茶资之用”,而不必交纳学费。

1854 年,这 5 所学塾完全免费,成为港岛最早的官立学校。它发展很快,至 1859 年,已由最初的 5 所增到 19 所,学生由 102 人上升到 937 人,每年由港府拨给的教育经费亦由 125 镑增到 1200 镑。^⑪官校中开设初级中文、中国经典、地理及英语科目。

自 19 世纪 60 年代,香港教育事业的重点转向了世俗教育。1860 年 7 月,理雅各建议停办所有位于维多利亚城的皇家书馆,把全部学童集中于一所新的中央书院。^⑫后获港府支持。1862 年 2 月,中央书院正式开学,其后,未并入该校的皇家书馆成为纯粹的中文小学,为中央书院提供生源,1864 年,中央书院共有学生 120 名,该校起初只分为初级中文班和高级英文班,经过几年以后又增加了预备班。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1868 年、1869 年还陆续增设了代数、自然、化学和几何学,并启用了一间实验室。

该校创办之初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后逐步重视英语教学。1878 年 2 月轩尼诗总督召集了专门研究英文教学问题的教育会议,决定改中央书院每天学习中英文各 4 小时的制度为 5 小时英文教学和 2 小时半中文教学。英文定为必修课,中文则改为选修,所有官立学校都被要求讲授英语,正式确定“重英轻中”的教育政策。该政策对香港学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轩尼诗的继任者们对其奉行不违。1895 年规定新设学校若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补助。港府甚至还停办官立中文学校及学校之中文班,直到 1902 年才准予恢复。^⑬

19 世纪时香港除西医书院外没有其他大专学校。该书院完全借鉴英国办学模式,课程设置也与英国各医科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任教者多为居留香港的外籍医生,且以在英国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者居多。学制 5 年。1912 年香港大学成立时,并入其中成为港大医科。

此一时期可视为香港教育制度发展的奠基阶段。

由于英国刚刚通过三项不平等条约占据了香港,主要精力始终放在建立统治秩序、维护局势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事项上,对教育的发展则基本上沿袭英国惯用的“不干预”政策,只是鼓励教会及私人团体去从事教育事业,政府则适当地给予资助,摆出“低限度承担”的姿态。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英人的这种“不干预”决非纯粹地放任教育发展。首先,港府于 60 年代初从教会手中夺回了对公共教育的管理权,并任命视学官专司其责;其次,多次成立有关委员会对香港教育进行检讨,并在《香港政府宪报》上逐年刊登香港教育的年度报告,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方针;再次,许多港督也通过召集会议、签署法令、视察学校和发表讲演等形式,对香港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另外,逐渐增加教育投入,实行经费资助,以影响学校发展。1853 年教育经费在当年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仅为 0.3%,以后则逐渐增长,1863 年为 1.07%,1873 年为 2.14%,1883 年为 3.08%,1893 年为 4%^⑭,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港英当局对教育的控制和影响的加强,其结果促使了香港教育行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是有相当限度的。

从学校设置方面来看,官立学校系统中有了初等教育机构和中等教育机构,后期甚至出现了接受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各级各类学校之中,仍以小学程度者居绝大多数,各级教育机构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各成系统,缺乏一种统筹力量,彼此间的关系亦未理顺。显然,港英当局开办和资助这些学校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这些教育机构培养出对香港及中国内地产生影响的亲英势力。1868 年史钊活在该年官立学校年度报告中,认为“部分中央书院的中国学生通过考试进入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就职”,具有“显而易见的间接的好处”,这些“好处”不在于获得与教育经费等价的短期效益,而在于帮助港英政府实现其“更高的目标。”^⑮1902 年香港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对皇仁书院的这种作用表达得更露骨:“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本文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本殖民地的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⑯

二、英占中期的教育制度(1901—1941)

随着外来侵略逐渐加深,民族灾难日益沉重,中国终于在 1900 年爆发了以反帝爱国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它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了各国侵略者在中国内地的嚣张气焰。其强劲冲击波也扩散到香港,震慑着港英当局,迫使他们改变统治方式,加强买办阶级的培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香港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 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1901 年,伊荣出任视学,初期皇仁书院不为所辖。1909 年,黎德校长离任,香港的官立学校包括皇仁书院在内便完全由一位教育司统管。教育司成为香港最高的教育行政长官。是年 4 月 8 日,港府正式任命伊荣为香港第一位教育司。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种政治活动广泛渗透到香港学校中来,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极大恐慌。为加强对香港所有学校的监督和管理,港府于 1913 年 8 月 8 日经立法局通过了《1913 年教育条例》,这是香港有史以来首次经由立法程序通过的教育法规。《教育条例》公布以后,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均须接受政府的监督。条例规定,所有学校(获得特别豁免者除外)一律要依法向教育司署注册,并要遵守《教育条例》的各项规定。未经正式注册的学校被认为是“非法学校”,其主持人可能被起诉罚款。该条例为后来香港教育行政提供了依据和法律保证。

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接受教育司视察的学校由 60 余所猛增到 1,200 余所。教育司署在扩大管理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为此港府于 1920 年成立一新的教育委员会,以辅助教育司改善与发展香港教育,当时规定委员名额除教育司、英、汉文高级视学官 3 人之外,再由政府委派 9 人,计 12 人(1923 年后增至 15 人),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教育司兼任。

英、汉文视学官负责港、九龙、新界各学校的一切教育行政事宜。凡学校教科书的审定、学科课程的进度、校历的规定、假期的颁布、学费的征收、教授法的指导、学校图书的购置、仪器设备以及学生会的组织管理等等,皆归其监督和检查。其中首席英、汉文视学官分别管理在香港教育司署注册的英、汉文学校,其余的视学官分东、中、西、九龙、新界等区,各自负责巡视该区的英、汉文学校。同时设有体育、音乐、美术、手工、地理等专科视学官,轮回视察全港地区的学校,并负责指导各校专科教员的教学及对各种教材、教具和设备进行管理。视学官之下,设有视学员,专门辅助视学官执行行政事务并视察各校。^⑩

中国内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度大力支持香港的私立中文学校,但由于两地在编制、设备、师资,尤其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双边活动的开展存在着障碍。中国教育部乃于 1931 年 4 月 22 日令广东教育厅通告香港各私立学校,要他们在港府注册的同时,也依照私校规程向广东教育厅立案。同年秋季,侨务委员会成立后,由该机构主管侨校的调查、立案和监督指导事宜,因而大部分的侨校,除了在香港注册,取得合法地位外,还在广东教育厅立案,后来,又向侨务委员会立案及教育部备案。

中国对香港侨校的积极领导与协助,使港府深感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势力在香港滋长壮大,1932 年港督会同议政局,按照《1913 年教育条例》第 26 条第 12 款,又订立了《规例 25 条》,其中对课室限额、卫生设备、消防设备、教育注册、课程时间、惩罚学生等均严加规定。次年 6 月 20 日,予以增修后再行通告。从此,香港教育条例的规定日形紧密,执行方面也较以前更为严格。

(二) 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1901 年,港府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对香港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进行研究,在其次年发表的报告书中,提出了指导其后教育发展的二项重要政策,一为加强英语教育;一为推行精英教育。1903 年港府修正教育补助条例,大致上依照该报告书的建议,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上层华人士子;英文学校远比中文学校获得重视。一时间接受政府补助的教会学校纷纷开设中等学校课程,新办学校也以中学居多。接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上升率(60%)明显增加,远远超过接受中文教育学生的增长率(10%)。^⑪

香港大学的成立也是上述政策的集中反映。该校于 1912 年正式创办,仿英国大学模式,采英文为教学语言,是一所不折不扣的以英式教育为蓝本的帝国大学。来此求学者绝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毕业后几乎都跻身于香港的上层华人阶层。港大初设医学、工科两科,继设文科。文科和工科学制 4 年,医科学制 5 年,入学考试以医科要求最高。香港大学是香港第一所可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香港出现了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较为完备的学校体系,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学制系统化的开端。

据 1938 年香港教育司的统计数字,香港有各类学校 1,249 所,学生总数 104,134 人。其中除了香港大学由香港总督直接管理和 6 所英文学校(圣士提反男书院和 5 所由驻军办理的英童小学)获豁免视察外,其余各中、小学都接受教育司署的监督、视察和管理。根据其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官立学校、政府补助学校和私立学校三类。

1. 官立学校

官立学校是指由港府拨款建校,由教育司署直接管理的学校。根据种族不同可将官校分为英童学校和非英童学校,共 20 所。其中官立英文小学一般有两种修业年限,一为 5 年制,即从第 8 班到第 4 班;一为 3 年制,从第

8 班到第 6 班,进入第 8 班的新生必须曾在中文私塾接受过 4 年的教育。英文小学的最高班为第 4 班,毕业生可投考皇仁书院和英皇书院的第 3 班。汉文学校初沿用传统的 4 年制,1933 年又根据中国内地学制,实行“6·3·3”制。

除师范学堂和汉文小学外,20 所官校中竟有 16 所为英文学校,可见港府严格执行着重英政策,对中文教育则不屑于发展。1935 年,英国教育家宾尼应邀来港,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对上述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后提交了《宾尼报告书》,建议港府要重视汉文小学教育,重新确定英语教育的目标,认为英语只具有应用及职业上的价值,水准无须太高,其他时间应努力发展中文教育,要港府将教育政策逐渐变成“第一,提供每学生足够的华语训练,使他们用于思考及表达;第二,进一步提供英语训练,以满足就业的需要。”^⑩但从日后的实施情况来看,港府根本未听取该报告书意见,中文小学教育只到二战后才始获重视。

2. 政府补助学校

政府补助学校是指由香港各教会及各团体筹捐款建校,由各教会、团体及私人管理呈请香港教育司署注册,并获政府经费资助的学校。根据其资助经费数额的多寡,又可分类,多者为补助学校,少者为津贴学校。其中各类补助学校计 18 所。津贴学校的数目远大于补助学校数,计 281 所,学生 21,777 人,其中既有英文学校,也有汉文学校,还有旧式私塾。

在 1940 年以前,大部分英文书院编制与官立英文学校相同,其课程设置也与官校相差不大,但对圣经科尤为注重,通常由教师或神父亲自讲授,考试时该科必须及格,否则不予升级,学生还被要求参加祈祷、做礼拜等仪式。女书院另外设有家政、音乐、钢琴、美术等科,任由学生选修,不过要收学费。汉文补助学校则采“6·3·3”制,以中文教学为主,某些课程也用英文教学,由英国人教授,其毕业生可参加香港大学入学试。不过协恩中学是个例外,它的课程是准备学生入读中国内地大学而非香港大学的。另外由于它与圣保罗书院和英华女书院三校是汉文学校,故所得政府补助也远低于英文补助学校。

3.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是指完全由私人投资开设,在香港教育司署注册的学校。数目高达 932 所,注册学生数 65,230 人。根据程度可分为中学和小学;根据语言可分为英文学校和汉文学校;根据教育性质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具体地说,其中有 145 所英文学校(6 所中学、133 所小学、6 所职校)和 778 所汉文学校(101 所中学、675 所小学、2 所职校)。所修课程,具体编制,大多同前述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

很显然,此期为香港教育制度的成型阶段。

就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而言,首先,港府设置了教育司署,任命了教育司,将整个香港教育置于统一管辖范围之内,解决了从前各类学校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日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确定了路向,构划了具体的功用特征。其次,制定了《教育条例》和《教育规例》,明确了教育行政必须依循的规则,使管理工作法规化、程序化。这些皆已具有典型的现代教育行政的特征。在学制发展方面,中等教育之上出现了与之衔接的高等教育,确立了由私塾而至英文中学,再至香港大学的上下一贯的体制。因此,无论是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学校教育制度在此期间皆迈出了发展的一大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制度的模式,是基本以此为蓝本,逐渐趋于完善的。

但是,客观地说,由于港英政府一贯地对教育采取消极保守态度,这种教育制度还很不成熟,挂一漏万之嫌在所难免。尤其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殖民因素充斥其中,加以英文学校为发展重点,漠视中文教育的存在;高级行政人员须由英人担任,从官学生中招取^⑪,未接受过英式教育的人至多成为助手,不能主事;香港大学建校目的是为港英当局培植亲信等,时时处处流露出阶级差别和等级歧视。甚至还专门为英籍儿童开设学校,以别于华人子弟。根据港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英国的儿童由政府另设学校来教育他们,不与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的儿童混杂。”^⑫港府办有 3 所官立英童小学和 1 所英童中学,加上由驻军办理的 5 所英童小学,构成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系统,即由英童小学至英童中学,最后以考升英国剑桥大学为目标。而为华人子弟办理的学校则构成另一系统,经由私塾,8 年制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完成教育,从而形成鲜明的双轨制特征。

三、英占后期的教育制度(1945—199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教育面临着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同时香港经济开始发展并逐渐转型,这些都向香港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港英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对旧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因势利导,改革教育体制,修正低限度承担原则,以“普及教育”取代“精英教育”,逐步建立以智力投资为主导的、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现代